

历史影像



乔有山上俯瞰北杏村



王尽美故居今貌



王尽美故居土炕

周末人物 红色记忆 不忘初心

1918年，春末夏初，一位绰号“王大耳朵”的青年从北杏村出发，去寻找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。“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。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！”每次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到结尾处，他总感到荡气回肠。

王尽美：“尽善尽美唯解放”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吕光玉

编者按

97年来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，初心不改、矢志不渝，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、生死与共。时代变迁，精神永恒。向前走，不能忘记走过的路；走得再远、走到再光辉的未来，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，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，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。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。唯有不忘初心，方可告慰历史、告慰先辈，方可赢得民心、赢得时代，方可善作善成、一往无前。今天，在中华大地上，沿着这些先辈砥砺前行信仰之路，追寻他们的足迹，触摸他们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，我们清晰地看到：他们脚踏实地践行着开天辟地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，坚定理想信念、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，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，将血肉之躯、信仰之坚熔铸成鲜红印章，加盖在时代的答卷上。本报今天开始在周末人物版和往事发现版开设“红色记忆 不忘初心”专栏，敬请读者关注并提供新闻线索。

“砥砺前行，弹心国事”

100年前，莒县北杏村（今属诸城市）的冬天，霜厚冬意浓。

在村子中心街南头，王尽美一家窝居在地主家的两间小偏房里。20岁的他，靠租种地主家的几亩薄地，养活着小屋里的祖母、母亲和媳妇儿。低矮的土炕旁，支着锅台。炕膛里的木柴和树叶，是母亲她们在村前南岭上一点点捡回来的。

朔风中的茅草屋里，在白天，仅借着阳光取暖。劳累了大半年的王尽美，终于得闲读书了。三年前，他高小毕业，一直在家参加劳动。

随着年龄和体力的增长，王尽美成了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。劳动繁重，负担沉重，家境困苦，但他一有时间就孜孜不倦地借书攻读。

对王尽美来说，上学是奢侈的。“他父亲穷得没有名字，人称王五。他出生前四个月，父亲撒手离世。这样的家庭条件，本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，但他八岁那年，本村地主见山堂家请了一位先生，为九岁的儿子祥儿设塾启蒙，同时还找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。他母亲听说后托人请说，才使他有了读书的机会。”诸城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海涛介绍道。

塾师先生见他生得耳大面方，天庭饱满，认为有贵人相，又听说他出生时红光满屋，便给他起了个学名“王瑞俊”，字灼斋。可惜不到一年光景，祥儿夭折，小瑞俊失学。

一年之后，小瑞俊有了给另一家地主的儿子——春儿陪读的机会。可不到半年时间，春儿也因患了和祥儿一样的急症不治身亡。一时间小瑞俊被不少愚昧的村里人传成能“妨”人。

失学务农的王瑞俊，饱尝生活艰辛。好在三年后，北杏村设立了村塾，才使他重新入学就读。由于品学兼优，先生对他关爱有加，免去了他的学费，还指定他为大学长。

一年之后，考上了积沟乡高级小学的王瑞俊依然出类拔萃。他的老师王新甫先生，毕业于济南政法学堂，给王瑞俊灌输了不少新思想。

王新甫还介绍和推荐了进步书籍报刊，如《天演论》《革命军》《民报》等，使王瑞俊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，开始萌发民主主义思想和救国救民的志向。

天资聪颖的王瑞俊是学习的多面手。王新甫老师笛子吹得很好，曾教他吹过《满江红》和《苏武牧羊》等曲目。他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和演戏，成为北杏村农民戏班子里的主角。他的书法也相当俊逸，并以才思敏捷、擅写文章闻名乡里。在由晚清进士庄陵兰编修的《重修莒志》中，如是记载：“王尽美……家贫苦学，弱冠入济南第一师范。砥砺前行，殚心国事。”

高小毕业后，王尽美扛起养家的重担，家中生活略有好转。可受压迫剥削的贫穷命运，并没有得到改变。想着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趴在土里的同胞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他在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。

十月革命胜利、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等消息，偶尔传到闭塞的北杏村，王尽美朦朦胧胧地感到，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剧烈变化中，自己应进一步深造，探求真理，有所作为。悄然间，他决定离开家乡，到济南继续求学。

可当他提出去济南求学的要求时，却遭到家人的反对。在那兵荒马乱的世界，王家三代单传的他要离开家乡，只身到五六百里外的地方去，家人怎能放心。王尽美只好耐心地解释，反复恳求，家人终于同意。

“铮铮乔有看沧桑”

1918年，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，南岭绿意盎然。临行之前，王尽美登上村前的南岭，俯瞰家乡的大好河山，赋诗一首，以抒胸臆：“沉浮谁主问苍茫，古往今来一战场。淮水泥沙挟入海，铮铮乔有看沧桑。”

海拔三五十米高的丘陵小山——南岭，在王尽美眼中，要洗心革面成“乔有山”，即要将之乔迁为劳动人民所有。百年时光，街巷疾走，记者再次登顶乔有山，北杏村已天翻地覆，红瓦灰墙的整齐民居铺展在山之北麓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只是，再也看不到村口那个背起简单行李去闯天下的年轻人的背影……

告别依依不舍的家人，王尽美意气风发地奔赴济南。那时的济南，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铁蹄蹂躏下，到处残垣断壁，商业萧条；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的劳动人民在尘土飞扬的街



1921年7月中旬，这位耳朵大、长方脸、细高挑儿、绰号“王大耳朵”的山东汉子，与邓恩铭一起，奔赴上海，与其他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登上红船，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之后，将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，取尽善尽美之意。

道上为活命奔忙不息……这让刚刚升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再次陷入深思。

奔着“师范”而来的王尽美，本希望师范里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发达教育的种子，将来能把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，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。可到校后，王尽美被老师摁在教科书、讲义中，却于“教育”二字并不顾及。

沧海横流，有舟者渡。1919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这使王尽美那忧国忧民、苦闷彷徨的心胸豁然开朗。他开始意识到，在当时时代条件下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，都操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客的手中，埋头读书，不问政治，对救国救民是无济于事的，也决不是青年学生应走的道路。

王尽美决心走出课堂，奔向社会，把读书同革命实践活动结合起来，把自己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，他欣喜若狂地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中。

1919年5月中旬，王尽美从济南回故乡。与在诸城县积沟乡高级小学一年级读书的王蔚明，谈起省城的新闻。

“尽美同志说，济南学生和全国各地的学生一样，响应北京学生的呼吁，已经组织起学生会来。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发展成学生罢课、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、游行示威、抵制日货的共同行动。”

同时，王尽美来到诸城后，得到当地教育界一些爱国人士的帮助，顺利开展工作的情况，向王蔚明说了一遍。

“尽美同志还对我讲了一些革命道理。大意是说，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一个皇帝，又出现了无数个‘小皇帝’。他们争权夺利，连年内战，生灵涂炭更甚于前。人们要想得到民主、和平和幸福，就必须再来一次革命。只有对内打倒军阀，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，中国才能复兴……”

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王蔚明，听了王尽美一席话，耳目一新，茅塞顿开。

“思想起了大翻身”

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王尽美，暑假后升入省立一师本科第十班学习。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，王尽美的思想有了飞跃。新学年开始不久，他联络省立一中学生邓恩铭和育英中学

教师王翔干等，闹了一次学潮，要求撤换昏庸反动的校长。

结果，换汤不换药。新上台的校长，仍维护腐败的旧教育制度。通过这次斗争，王尽美认识到，旧的教育制度，绝不是撤换几个校长所能彻底改变的。只有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，才能改变旧教育。

五四的劲风吹到泉城，鼓动着思想的萌芽。当时，文化运动的空气充满全国。北京、上海新的出版物总有数百种之多，而所销册数在十万份以上。而济南直到1919年9月，由议会的王乐平和进步教师等组织成立齐鲁书社，大力推广介绍有价值的文化运动出版物后，状况才很快有了改观—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《少年中国》《新教育》等杂志在济南的销售数都达到了百份左右，新出版物在济南每月的销售量达到千份以上。

“我在五四运动前，思想还是顽固，爱读古书；五四运动中，受到感动；五四后，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《新青年》。记得我第一篇看的是陈独秀的论‘新青年’，使我的思想起了大翻身，产生绝对反对旧东西的思想。”与王尽美同为一师同学的延波真曾回忆说，“我们从报上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，实行社会主义，从军阀侮辱共产党的布告中，知道中国也有共产党，但不知道去哪儿找共产党。”

此时的王尽美，在一师策划上演胡适所写话剧《终身大事》。接着，他又组织演出新村政《芙蓉镜》，是学生改革村政的故事。

搭乘齐鲁书社的顺风车，马克思主义在山东落地生根。齐鲁书社着重介绍、推销《俄国革命史》《辩证法研究》《社会科学大纲》及《新青年》《莽原》等刊物。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经常到齐鲁书社借阅、购买进步书刊，探讨救国救民、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。

时代越乱，主义越纷杂。五四运动后的济南，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，思想界比较活跃。既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，也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的宣传，青年的信仰在左右摇摆中，迅速变化着。

“必是赤旗的世界”

王尽美吃下决心丸的时间，在1920年。这年初，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

“1920年3月，以北京大学为主，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，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。我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。……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，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，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，交换刊物。”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党员罗章龙回忆道。

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，王尽美刻苦攻读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。在此之前，由于看到请愿团几次赴京的失败遭遇，他曾认为一切政府都是坏东西，出于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、反动政府的无比憎恨和不满，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，崇拜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人。

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澎湃，王尽美通过阅读李大钊的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文章，听到了李大钊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的呼声，开始追随马克思主义。

“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。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！”多次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每到结尾处，总让王尽美荡气回肠。他认识到，穷人所以穷是阶级压迫的结果，依靠“教育救国”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暗杀都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才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，走上光明灿烂的前程。于是，他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
1920年夏秋之际，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济南，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(Communist，现译共产主义)学会，以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，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，继而研究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。

同年8月，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函邀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。王乐平把来函交给了王尽美和邓恩铭。这年秋天，共产国际代表之一杨明斋从上海回平度老家探亲，路过济南时，与王尽美、邓恩铭等共商建党一事。

同时，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励新学会，广泛吸收群众，于1920年11月21日，在商埠公园大厅成立励新学会。

“励新”，寓有以新思潮互相砥砺之宗旨，学会经常举行学术谈话会，举办讲座会，发行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刊。

主义犹如一面旗帜

当时，与王尽美、邓恩铭一起参与山东党组织初创的，还有育英中学的老师、诸城人王翔干。“父亲在旧社会和封建家庭中度过的时间较长，他对旧社会和封建家庭中的矛盾认识得更清楚，感受得更深刻一些，革命的立场较之某些青年人为更坚定。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最彻底、最革命、最科学的理论，劳动人民是革命必须依靠的力量。他自己改号‘勉园’，就是尊崇劳动神圣的意思。所以他和王尽美、邓恩铭同志等最为志同道合。”王翔干的子女撰文回忆。

王尽美和王翔干亲如家人。“他经常到我家聚谈，以至曾经引起母亲的怀疑不安。她有一次向祖母反映：‘那个大耳朵的天来，叽叽喳喳的不知道有什么背人的事。’她哪里知道这是她在筹划有关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大事。”王翔干的大女儿王翔曾回忆道。

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王尽美，开始将其转化为实践指南。自1920年10月起，他接连发表数篇文章，讨论师范、乡村和女子教育问题。在11月初的《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》一文中说，“我以为师范功课，最好自预科起，就把关于教育的书籍，完全添入，如《平民教育的意义》《乡村教育》《教育原理》。教育哲学、小学组织法、小学教授法、国音学、儿童心理学……和旁的科学相提并进，由浅入深，久而久之，自能领会贯通。将来办学，自不会与现在师范毕业生同一结局。”

在《励新》杂志首期中，他写道，“近来，新思潮蓬蓬勃勃过来以后，便与前大不相同了。大多数青年，已经有了觉悟，便凭着老实读书以外，个人和社会、和人类还有种关系，非常重要，已注意到这上头，便对于从前一切的制度、学说、风俗……等等都发生了不满意，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……”

建立励新学会，对王尽美来说，是一种组织生活的历练。这里不仅仅有人的聚集，更是

主义的结合，主义犹如一面旗帜，立起来，大家才有所指望，才知所趋赴。

1921年春，杨明斋再次路过济南，与王尽美、邓恩铭等再次共商建党一事。紧接着，以齐鲁书社为基地，王尽美、邓恩铭、王翔干、王象午及印刷工人王复元等，发起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。那时党组织的运行在地下进行，王尽美时作小学教师装扮，皂鞋白袜，长衫礼帽，彬彬君子，似有学究气。

1921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，天气晴朗。王尽美领着一群青年学生，来到千佛山下的一片小树林里，围坐在嫩绿的草地上。他们静听王尽美讲中国的前途命运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。

正当学生听得入神之时，从东北角突然来了一群武装警察，为首的还持着指挥刀。学生一阵骚动。王尽美却十分沉着冷静，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对大家说：“任何人不要动，还是听我一个人讲话。”随即他从容不迫地改换了话题，讲起唐诗。这样一来，同学们立时消除了紧张情绪，会场恢复了平静。

待警察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群学生在听老师讲古诗。“他讲得有声有色，连那些警察都听呆了，那个领头的用刀柄撑着下巴也听入了迷，直到全诗讲解完，他们才不太情愿地陆续离去。事后，我和其他会员，无不赞赏王尽美同志的机智勇敢和指挥若定的出众才华。”育英中学学生、曾参与励新学会的周仲千回忆道。

向光明路上去寻人的生活

1921年春，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甫一建立，其成员便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发动产业工人。

王尽美来到铁路大厂的“红房子”公所介绍苏俄的情况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同工人交朋友。王尽美、王荷波还在公所组织了工友学习班，发了石板、石笔，教工人们识字读书，发现并培养了多名工人骨干分子，并派李广义、黄锦荣去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学习。他们回到济南，迅速向王尽美和王荷波汇报了参观学习的经历。

同年5月，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组织了济南劳动周刊社，创办了《济南劳动周刊》。王尽美与他人共同起草的宣言中，声明创办周刊的目的是“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，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”。

在王尽美的亲自指导下，1921年6月上旬，以红房子公所为基础，成立了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，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组织。

随后，在北大槐树和中大槐树办起了四处工人夜校，吸收300多名进步工友参加。一年之后的1922年6月18日，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正式成立，这是山东省第一个企业工会组织。从此，“铁路大厂”的工会组织成了山东省、济南地区工人运动的排头兵和风向标。

“红房子”孕育出的红色火种，不仅点燃了济南，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熊熊烈火，还影响和推动了津浦铁路沿线工人运动的进程。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名，而“铁路大厂”就有16名，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.6%。

1921年6月底，王尽美、邓恩铭在济南见到前去上海筹备中共一大的张国焘。“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，在大明湖的游船和我聚谈了一天。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，向我提出许多问题，不厌其详地要我讲解。他们一面静听，一面记录要点，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。他们来到上海以后，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，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。”张国焘曾如是回忆。

此时，王尽美与王用章（后叛变）同居一室，共度艰苦生活，在艰苦中开展工运。奔波终日，不得饱食。有时日食一餐。在这样的生活中，经常奔走群众中间，以身作则，领导群众积极工作。有时遭受意外打击，亦不灰心。“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，实在值得后人效法。”王用章在三十多年后曾供述。

1921年7月中旬，这位耳朵大、长方脸、细高挑儿、绰号“王大耳朵”的山东汉子，与邓恩铭一起，奔赴上海，与其他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登上红船，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之后，王尽美将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，取尽善尽美之意。